责编 崔 燕 王 瑜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吕 雪

张毅

蓝调乡愁

这座老城有许多街道，路面是马牙石铺的，石材自然来自城市东部的山脉，因为时间久远，淡青或暗褐色的路面凹凸不平，留下了时间走过的痕迹。

这里有许多里院，里面住着当地土著或开埠后的移民。里院大都门洞对门洞、胡同套胡同、小巷连小街，家家相对，户户相邻。傍晚，李家炒菜，辣椒被冒着青烟的油一炸，辣得王家人睁不开眼；刘家的煤炉飘着的蓝色火苗，呛得吴家人直咳嗽。里院房间狭窄，空间逼仄，常常几家邻居共用一个厕所和水池，方便时，要穿过堆满杂物的走廊，走廊两旁是斑驳脱落的墙壁，几双旧胶鞋挂在墙上，自行车斜依在楼道里。因为空气潮湿，门前长了青苔，房门响起的时候，浑浊的吱嘎声轻轻回荡。晴天时，家家户户在窗口横根竹竿，人们把衣服从箱子里搬出来，在太阳下晒。街上常有臭鱼烂虾的气味，还有房间角落里的潮湿霉味，这些复杂味道只有大风才会把它吹走，换上一些新鲜空气。

我住的老街周围散落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式、日式建筑，铁路与港口在这里交汇，货轮汽笛和火车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这是一个产业工人混杂的地方，从衣着上就可以分出他们的职业，那些穿蓝色工装，戴柳条帽的是码头装卸工；穿灰色工装戴大檐帽的是铁路工人；穿绿色工装的是邮政工人。码头上泊着装满集装箱的货轮，货轮巨大的钢柱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来自各国的船员常从高高的舷梯上走下，沿海边的沙石路走出码头。我喜欢那些体积庞大的货轮，闲时，我会穿过堆满木材和矿石的货场，绕过几辆正在卸货的吊车，去看码头上的货轮。远远望去，那些静卧在泊位上的外国货轮，船体上半部分大都漆成黑色，下半部分是砖红色，船体在碧蓝的海水里轻轻晃动，像一头头巨兽。我知道，每艘货轮都要越过茫茫大海才能来到这里，每艘货轮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夕阳西下，海面飘来一艘木船，妇女们急匆匆朝码头走去，海风吹拂着她们。她们手搭凉棚遮挡正在下落的太阳。海边的小码头上，几根腐朽的木桩立在那里，旁边有几条陈旧的木船，木船被一根乌黑的粗麻绳拴着，在水面上晃晃悠悠，仿佛是被风吹动的一片叶子。人们把船拖上岸，系住缆绳，收好帆和桨。鱼在网里跳动，有鲅鱼、青鱼、黄花和八带鞘，人们背起渔网朝岸上走去。石子路斜坡向上，通往老旧的楼梯或幽暗的木门。

是的，老城有很多沿山势形成的斜坡，由一层层石阶筑成，这些石阶从老街开始，一直延伸到上世纪末。这里有许多哥特式或罗马式建筑，结构以混凝土与花岗石结合，它们由欧洲设计师和中国工匠共同完成。那些建筑有雕花铁门和曲折的石阶，回廊穿过许多岁月，两边的花园低音持续。墙上爬满了爬山虎，这种葡萄科属的植物，枝条粗壮，老枝灰褐色，幼枝紫红色，喜阴湿环境，夏季开小花。路边的法梧桐撑着巨大的树冠，蝉声响彻夏天的街道。这些挂满果穗球状的树木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悬铃木，其叶子大，掌状分裂，花淡黄绿色。悬铃木最早分布于东南欧、印度和美洲，青岛开埠以后，这个树种也随之来到青岛，并被分布在老城的街道上，扮演着“行道树之王”的角色。在这被绿意包围的房子里，屋里铺着杉木地板，光线从窗口射进来，斑驳地落在油漆剥落的地板上。如果你推开窗口，城市自近而远层次分明：开埠时期低矮的民房、殖民时期的哥特建筑、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共同构成这座城市的底色。早期资本象征的当铺、钱庄、商号、绸店，给城市涂上一层异族文化的色彩，令人有着无限的倦意与怀念。

移民是这座城市居民的主体成分。我有一个刘姓邻居，80多岁，是最早的岛城移民，住在不足8平方米的陋室里。刘大爷是个修鞋匠，每天坐在老街路口，戴一副老花眼镜，反复用锤子砸一双鞋。他偶尔会抬起头来朝远处看看，然后点一支烟。烟是“葵花牌”的，两毛钱一包，抽到半截，用手掐灭，放在工具盒上，等下次再抽。刘大爷每天自己生炉子做饭，烟熏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夜里，他咳嗽的声音像是楼顶掉下来一块砖头，老远都听得见。我有时担心他一口气接不上来，就背过去了。有段时间，很久没看见刘大爷出来修鞋。那年除夕，街上已是焰火满天，老人早早把门关上了，他已习惯了孤独。我在门外敲了半个小时，只想送上一句问候，他开门后满脸泪水。正月十五晚上，刘大爷在隔壁喊一个人的名字。从那天开始，他晚上都在喊那个人的名字，像在哀求，又像是呼救。隔几分钟就喊一次，他的声音随着时间渐渐微弱下来。没过多久，刘大爷去世了。那天下过一场雪，气温陡降了许多，天气阴冷。我到他屋里时，看见几个邻居都来了。人们脸色沉默着，为一个老人送终。刘大爷被邻居们抬着，一步步走出老街。街口停着一辆小型卡车，载着他去了位于郊区的火葬场。

事后，有人说他其实不姓刘，只是没人知道他到底姓什么。

他是谁？他的老家在哪里？他有儿子或女儿吗？

他和每个老街的邻居一样，经历了生命所有的快乐和悲伤。有平静的、喑哑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人生秘密，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某个冬夜，我在家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这是一部讲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电影。戈尔恰可夫是位诗人，他到意大利搜集关于俄国农奴作曲家的资料，打算根据其生平写歌剧剧本。戈尔恰可夫在意大利期间强烈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只能在某种距离之外观看别人的生活。《乡愁》里有一组关于“家”的片断：草坡上的房屋在烟雾中时隐时现，远处有几棵树、两匹马、一只狗以及乡亲忧伤的身影。画面透着对家园深切怀念和永远无法回归的情愫。在这里，塔可夫斯基要说的不是具体的“家”，而是关于人类深层意义的心灵史。

我有一个当水手的朋友，他去过世界许多港口。他见到过鲸鱼列队从海上游过。他喜欢大海和航行。一年夏天，那个朋友出海再没回来，他被风暴留在了海上。他临走前送给我一只口琴，那是一只“布鲁斯”口琴，金属簧片，音色纯美。他去世那天傍晚， 我在深入海水的礁石上，看到夕阳没入海水的瞬间，大海那么安静。岸上的房子那么安静。喧嚣的人群那么安静。我在沙滩走着，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一群海鸟逆风飞来，那群海鸟在海面变换着队形，仿佛移动的星座。它们把叫声撒落在寂静的大海里。

这座老城有说不尽的往事，它已被岁月诉说并将继续诉说着。这里的每座建筑、雕花的铁门、粗粝的石头；夏天灼热的阳光与涛声穿过玻璃；时而平静时而狂暴的大海；沙滩裸露的皮肤与被海水浸透的木船；电车划过夜空时尖锐的呼啸和窗外起伏的叫卖声……它们像时间的沙砾从我手指间滑落，在落日的余晖里。

宋扬

车轮飞转的时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父亲从区供销社推回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榨油厂在区下辖的一个乡设立了棉籽收购点，父亲被派去管采购。来回四十多里地，又不通客车，走了几个月的辛苦路后，父亲咬咬牙，买下那辆“二八圈”的自行车。

那车如一头敦实板扎的黑“铁牛”。车龙头弯弯的，像牛角。油黑泛光的三根钢管组成一个三角形，支撑起一头“牛”的骨架。链条也乌黑锃亮。父亲把自行车支起来，让后轮离地，反向一转，齿轮与链条哗哗的摩擦声如泉潺一般均匀悦耳。再向前一蹬，车轮飞转，成了一个模糊的圆。一根根细细的、排列规整的钢丝把竹林、夕阳和车旁花狗“旺财”的身影切割得明明灭灭、闪闪烁烁……

父亲骑在“铁牛”上，比他站在我家那头老黄牛拉的铁耙上更威风凛凛。吹过田野的风也吹过乡村土路，风驰电掣中，父亲洗得微微泛黄的的确良白衬衣高高飞扬。

我也梦想能拿“铁牛”当坐骑，我比以往更期待父亲回家了。小学四年级那年，父亲终于答应教我骑车。他载我去了村上的大晒坝。因为个儿小腿短，我只能把右脚从车的三角区域伸过去，探住右边的脚踏板。车，被我骑得一冲一冲。虽然撅着屁股，重心偏移，车依然载着我摇摇晃晃上了路。从扶着车让我滑行，到脱手让我自己飞奔，父亲站立晒坝中央，夕阳的柔光照在他的身上，他像一个将军，满眼都是即将把一个“新兵蛋子”操练成虎贲猛士的自豪……

初二时，父亲上班的榨油厂搬去了县城。没了工作的父亲又在区邮电所谋了个临时工作——送信。邮电所配给父亲一辆崭新的“邮政专用”自行车。每天，父亲从家出发，骑五华里路到邮电所，装上书报、信件、汇款单，再骑行四十多公里到镇下辖的五个公社。

天刚麻麻亮，父亲把母亲当天要卖的两口袋洋芋、莴笋等绑到自行车后座两侧。菜太多时，车由我骑到区“综合市场”，父亲和母亲分别挑着一担蔬菜跟在我后头。父亲和母亲步行，又挑着担子，自然赶不上我。我把车骑到“综合市场”，找到母亲卖菜的固定摊位，把车架起来。乡下民风淳朴，车不用锁，菜不用管，也不用等到父亲和母亲到来，我立即背上书包去区初中学校上早自习。初中三年，我几乎每天都是全校第一个进大门的学生。后来，我常常想：我能考上高中，应该说与帮父亲骑车运菜的经历不无关系吧？在力所能及替父母分担生活重担的同时，我也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学习时间。而我的父亲，除了种地，还要当临时邮递员，虽然更辛苦，但他比村里其他男人多了一份工资收入，也就带给我们家比别家稍微殷实一点的生活。

如今，父亲随我定居城市，自行车并没有完全淡出他的生活。父亲在二手自行车市场居然淘到一辆与他的“老二八”一模一样的自行车——依然是浑身漆黑的一头大“铁牛”。父亲在自行车后座上安装了儿童座椅。每天，父亲骑着他的“铁牛”接送他的孙女往返幼儿园，依然像将军一样威风凛凛。

父亲又在打理他的自行车了，他握住车的脚踏板用力向前一转，车轮飞转，成了一个模糊的圆。那一刻，我隐隐觉得，时光在慢慢回溯，那些沉睡在我们父子俩心头的自行车往事在那个模糊的圆里瞬间复活了，并变得越来越清晰……

栾承舟

鹤山走笔（散文诗四章）

七蹬楼

其实没有楼，只有七级台阶，如花瓣，开在鹤山心上。

一步，一层天地。

一步，一层快意。

一步，一片沉思。

伫立于一天的纵深，李灵仙，此时，你在何处礼佛？

今日，我来问你，此时，为何要将铜钱掷于深涧？你的内心，玩些什么玄机？

世间有好些事说不明白，像七蹬楼，就是。

所以，对待古迹，传说，我们不必痴迷。

朝阳洞

脸儿，朝向东方；思想，朝向海之神秘。

我们心中，大地心中的那方蓝手帕，凉凉地，如风飘动。

岁月和风，坐地日行。

梵高的向日葵，生命的向日葵，轻盈如鸟，开过几回？又谢过几回？

它的脚步比风还轻；说话的声音，比北极还冷。

它的眼波，有时温暖如山中岁月，有时又变得锐利如刀。

相隔很远，我在鹤山海蓝色的眼睛里读你，

朝阳洞，突然变得认不出的年轻……

沐浴盆

鹤山极顶，有一石穹，名沐浴盆，相传为仙女梳妆处。

那不是一只盆子，那是一粒种子。

是一位哲人放下的种子，思想的种子，引你沉思命运之神秘的种子，放在我们面前，放在我们心中。

是美的种子，飞天的种子，引你泪水浇灌就能看到并收获的种子。

那种子会长出一个秋天。

这样的种子，对于我们，是不是还很重要？

那是哲人的沉思，盛在里面，叮咚有声，奔放夺目。

山之魂

滚龙洞下，一只黄鼬悄悄走过，无惊，无怖。

多么陌生、新奇的灵物，不拘一格地随意，施施然，走过。

自由的光，蛇般游弋。

面对枪口，面对邪恶和仇恨的人群，我的朋友，你，怎可如此大意？

蹑手蹑脚，一直聚居于我们想象中的困兽们，也相跟着冲出，丰富，微妙，温馨，野性十足。

人世间，哪里还有这样奇绝人寰的情景？

我们，曾是那么紧紧地关住他们。

是一个瞬间，也是整整一生。

什么时候，我们，也闲庭信步，在自己的家园，让灵魂全身心地放松，悄悄地走上一走？

荐希华

如剑香蒲

当剑指苍穹的长叶枯黄，折弯在一池秋水之上，是时候把蒲草移栽到文字里了。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经·陈风·泽陂》中那个“美人”，是青年才俊吧，让少女怀春；又或许是窈窕淑女吧，让人寤寐思之。而蒲与荷相提并论，衬托出“美人”的修长洒脱，柔美姣好。由此可见，古人透过《诗经》给予了蒲草很高的社会地位。

蒲有很多种。《诗经》的“蒲”字多有蒲柳和蒲草之辩。蒲柳，多种在河边住宅周围，又名水杨；蒲草，亦有香蒲与菖蒲之分，均属水生或沼生草本植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菖蒲不是唐菖蒲。唐菖蒲原产于南非，后来由日本传入我国。我们使用“唐菖蒲”这个名字，实际是日语直接拿过来用的。

《楚辞·思美人》中说“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烝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屈大夫以香草自居，认为芳香与污垢混杂在一起，芬芳的花朵仍能从中生长。香气浓烈飘溢四方，充盈于内自然会向外散发。所以，他即便被放逐后仍能声名远扬。我想在屈大夫眼中的蒲草，应该就是香蒲了。但是他终究是没有蒲草的如剑坚挺，在希望破灭之后愤然投江。蒲叶似剑，跟野艾一起捆绑，高悬门楣，可消除五毒，斩妖杀魔。

“根据屈原的道德标准，菖蒲与野艾，可是有香草香木与恶草恶木之分的，双方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到北中原，让我们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下子都捆在一起，结成端午同盟”。冯杰的《泥花散贴》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他这样对比了蒲草与野艾。我想冯杰是没有搞明白：菖蒲不是香蒲。屈原的香草很多，即包括了艾灸，当然也包括了香蒲。

端午时节，在我们胶东半岛，是用蒲草来捆绑粽子的。从水塘里采摘长长的蒲叶，趁鲜劈成细细的线条，晾晒到半干就可以用了。如今很多人图省事，用麻绳来捆绑粽子，就少了些许韵味；更有甚者，用丝线缠绕，简直绑住了粽子野性的灵魂。

蒲扇，蒲草编制成的扇子。跟诸葛孔明的羽扇纶巾不能相提并论的，人家那是身份的象征。而蒲扇，更加接地气。跟芭蕉扇相比，蒲扇柔韧性好，有更舒服的手感。蒲扇上编有花纹，这跟编制苇席一样，是我小时候大人们暗暗较劲的课题。现代人多用空调、电风扇。一把蒲扇成为古董了。小时候在月光如水的晚上，我们睡在庭院里的凉席上，母亲用一把蒲扇驱赶蚊子，沐浴那一波又一波轻柔的清凉，一个童话便在甜美的梦里诞生了。那样的回忆虽久远依旧温馨……

香蒲开花，每朵花都极其细小，它们紧紧聚在一起，看起来像个棒槌。冯杰把它描述成“暗夜的红烛”，画面感跃然纸上，似乎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夜晚，一位身着春衫的少妇在罗帐外托腮凝望，半截燃烧的红烛正潸然泪下……这个比喻暴露了作者的年龄。现在人看到那褐色的花棒，大概率会想到腊肠吧。儿时的记忆里，鲜嫩的棒槌也是美食之一呢。其实香蒲的根和白色的嫩茎都是可以炒食的。但即便是在物质非常贫乏的年代，胶东半岛的人们也没有去挖掘蒲根来吃。倒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开发了很多满足味蕾的新品种。

回望经典，《诗经》之草木人间，苍翠茂盛；《楚辞》之香草美人，遗世独立。展望未来，所有的蒲草列队站在一池秋水中间，依旧欣欣向荣，容颜未老。

李培德

老石磨

从我记事那年起，那盘石磨就安在我家最东面那间屋子里，我们习惯把那间屋子称为磨房。

磨房里除了那盘石磨之外，就是几样配套用的两张粗细箩挂在了东面墙上，一把笤帚习惯性地放在磨盘上。由于年代久了，安放石磨的地面上，有一圈浅浅的凹痕，那是经年历月推磨时走出来的。

听父亲说，曾祖父在的时候，就有这盘石磨的存在，至于究竟有多久，也无从考究，估计也得有二百年了吧。

生活在县城老城里，不像在乡村，在乡村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盘两盘的石磨，而在城里面每条街道，几十户人家不一定能摊上一盘石磨，所以我家那盘石磨也是整条街道上唯一的石磨。正因为有了这盘石磨，我家平日里来来往往的人总是不断，今天张家过来磨麦子，明天赵家过来磨玉米，后天王家过来磨高粱……

说来也幸亏我家那盘磨石质坚硬，是用一种青色花岗岩石材做成的，不然的话每年光请石匠来调理磨盘的磨线的费用都掏不起。

我家那盘石磨质量不错，两盘磨片比别人家的厚实了许多，加上石质坚硬，磨齿耐磨，磨起面粉来，又快又细，别人家磨一次粮食需要来回地倒腾四五遍，我家那盘磨两三遍就可完成。所以左邻右舍都说我家石磨好用。不仅本街上的人过来磨，甚至临街的人也过来。

当然，前来我家用磨的邻舍，也不是白用，用完之后都或多或少的扔下三分五分的钱，有的人家钱不方便时，便给留下一瓢半瓢的面粉，以充当用磨的费用，至于给多给少，母亲从来不会计较，都是街坊邻舍的，就是为了图个方便。

就是这盘老石磨，曾经给我们全家立下了功勋，真可算是大功臣了，几乎是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那还是久远的过去天灾困难时期，

升远 图

街道上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吃不饱，生活上极度困难，前来我家磨面的人越来越少，几乎都缺少粮食吃，许多都去了城外挖野菜充饥，也没有了过去那排队的繁忙，每天只有个两三户过来用磨的——过来用磨的也不再是磨麦子，玉米等优质粮食，大多都是拎着半篓子地瓜干和一小袋高粱米，过来磨一下。磨地瓜干的时候很繁琐，首先得把地瓜干用锤子砸碎了，然后再放到磨眼上磨，非常费功夫。

那时母亲从来不收他们的费用，也不向人家要这要那，母亲心里明白，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苦。然而，尽管母亲不收费也不要面粉，但当他们用完了磨之后，母亲便叫来父亲，把上面那扇磨盘，用劲抬起来，中间用石头隔开，用笤帚慢慢地一点一点把遗留在磨膛里的面粉扫了出来，每次都能扫出二两三两的面粉，你可不能小瞧了这二两三两的面粉，这对当时我们全家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虽然这点面粉不足以做成饼子和窝窝头来充饥，但每天用来拌着野菜做粥吃还是绰绰有余的。

那个时候，每当到了年关的时候，有一部分日子稍稍好过一点的人家，偶尔过来磨一点麦子，以备过年能吃上顿饺子，这些人家用完了磨总是给母亲放下一小瓢磨面粉箩下来的麦麸皮，走了以后，父亲母亲仍然忘不了扫磨膛里那些余粉，那可是白面粉，虽然次数不多，可经母亲一点点的积攒，到了年三十晚上也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饺子。就这样，我家那盘老石磨，伴随着我们全家六口人度过艰苦的自然灾害时期。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人们的生活也渐渐的好了起来，街面上也出现了很多加工粮食的小作坊，他们用的都是机械加工，随之，我家那盘老石磨也闲了起来，静静地躺在磨坊里，除自家偶尔用一下，再没有任何街坊邻舍过来用磨了，母亲一是不舍得到外面加工花钱，二是总觉得机器磨出来的面不如石磨磨出来的好吃，所以总是乐于用自己家的石磨来磨。进入到八十年代，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翻盖房子，母亲只好把那盘老石磨送给了住在乡下的五姨。

每到年节，我到乡下五姨家看望他们的时候，总免不了在院子里围着那盘老石磨转它几圈，用手轻轻地抚摸几下，仿佛有着许多的不舍。

从石磨到机磨，历史总是以飞快的脚步在前行着。如今乡城里外都不用石磨了，放在五姨家的那盘老石磨，带着它曾经的喧闹和忙碌，以它那古朴的身姿静静地卧在那里，仿佛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成了一件雕琢时光的老物件，也成了那段历史岁月的标本。虽然老石磨已褪去了身上那些昔日的现实功能，但它给我留下的是童年的记忆和对今天美好生活的见证。